

中国历史的特殊读本

■ 改变中国历史的文献

■ 龚鹏程 ■ 主编 ■ 上卷 ■

改变中国历史的文献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改变

中国历史的

文献
上卷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龚鹏程

主编

周凤五
陈韵

林素清
沈宝春

郑志明
周志文

简宗梧
简松兴

李春
黄复山

周益忠
蒋秋华

王德
林保淳

编撰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改变中国历史的文献/龚鹏程主编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10. 1
(大众历史经典馆)

ISBN 978-7-5008-4649-9

I. 改… II. 龚… III. 历史—文献—汇编—中国—先秦时代—民国
IV. K2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06244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 编: 100120

发行热线: (010)62005049 62005042

网 址: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: 750 千字

印 张: 55.25

定 价: 82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新版序

龚鹏程

本书既是一部文章精选，也是一本特殊的中国历史读本。

历来著名的文章选集，如《昭明文选》《文苑英华》《古文辞类纂》《古文观止》等，或为文献之辑存，或着眼于文学艺术。可是孟子曾说过：“《诗》亡而《春秋》作。”意思是说古代《诗经》中之诗均可表现其时代，故均有史义；其后孔子作《春秋》，正是继承着这种记录历史的功能。后世谓诗与史相通，即由孟子此语而来，如钱谦益就说：“曹之白马、阮之咏怀、刘之扶风、张之七哀，千古之兴亡升降、感叹悲愤者皆于诗发之。驯至于少陵，而诗中之史大备”（胡致果诗序），谓曹植、阮籍、刘琨等人之诗皆可作史读。其实孔子说“诗可以兴、观、群、怨”的观，讲的便是这个意思，通过文学作品，确实足以观察那个时代。文学虽然另具有兴、群、怨之功能，并不局限于“观”，但足以观世，无疑为其一重要作用。

可是，诗足以观世，也只不过是泛说文学之一种性质罢了，不是所有文学作品均可以观世，亦不是所有作品在观世的价值上都一样。文学中，有些偏于个人情志的抒发，有些偏于艺术技巧的探求，只有少数与历史的发展直接相关。因为，包括杜甫之所谓“诗史”，大抵也只显示着诗人在世局变动中的咏叹，而非那些作品创造了历史或直接标记了历史的轨迹。因此，诗史相通，必须再进一步，才能讲“诗即是史”或“诗以成史”。

本书做的就是这种工作。我们选辑的文章可分两大类，一是文章改变

了历史，二是文章标记了历史的改变。

前者是说中国的历史因这些文章而改变了命运，或者倒过来说，是这些篇章形塑了中国。例如，若无李斯《谏逐客书》，秦国可能就把包括李斯在内的各国游士全赶回老家去了，那么后来秦也就未必能统一天下。若无董仲舒《贤良对策》，汉代黄老之治的现实即不会改变，中国尔后独尊儒术的历史也未必即此确立。又若无梁启超《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》引发了倒袁的风潮，袁世凯称帝之事到底如何了局，亦无人可以逆料。故这类文章可说是具体牵动了历史。

后者，则是历史变动之直接证词。例如政事方面的汉文帝《除肉刑诏》、《南京条约》、《太平天国奉天讨胡檄》；学术思想方面的《论六家要指》、《移让太常博士书》、《大唐三藏圣教序》、《论迎佛骨表》、《太极图说》、《译几何原本引》等，或代表一个新观念新时代之出现，或宣告了变局之形成。

两者结合起来，中国的历史轨迹即粲然可见。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这些原始文献更能直接说明历史了。对于历史，我们这一代人总是忙不迭地替它解说，用我们的想法和一套套的理论去涂饰它，其实把这些文章摆出来，由它们自己说明自己，岂非更为直截真切！

就文学来说，曹丕曾在《典论·论文》中言道：“文章者，经国之大业、不朽之盛事”。这是中国文学最高的理想，但实际上，一般文章何足以语此境界？真能达致于此者，恰就是我们现在甄录的这些文章。说也奇怪，前面讲过，这些文章本是因它所具有的历史价值而被我人注意到的，但从文学性看，此类文章也无一不佳，多为千古名篇。这似乎又可印证孔子所说：“言之不文，行之不远”。凡在历史上足以形成伟大影响或足以昭示后昆者，其文采亦必足观。

我们这本书，就是依观世与观文这两个目的而作，两者且是合一的。起于尧舜、止于孙中山先生过世。此下历史更有新变，未来将再赓予补述。体例上，先录本文，次作注释，再译白话，继而有背景说明，最后是简述该文的影响，以便理解。

昔年在台湾编这本书时，我们都还青春年少，但对历史不无苍凉之

感。顷则年华老大，但对中国的未来、历史的机运反而渐趋乐观。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为此书费心重为检校，使它有机会跟大陆的朋友见面。也希望这样的选本能对有兴趣观乎人文、察于时变的人有所帮助。

最后还要补充两点：一、我们采用的古籍版本，可能略有几处跟大陆通行本不太一样；二、译文和解说时提到的现有地名，其县市行政区划，也可能有一二处会与现况不同，幸请留意。其它编辑命意，原书旧序已讲得很清楚了，此即不赘，敬请读者诸君指教。

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于北京

历史，在转捩点上（原序）

龚鹏程

观乎人文， 察于时变

“江声不尽英雄恨，天意无私草木秋”，历史的惊涛骇浪，翻翻滚滚：奔腾处，激越慷慨；低回处，幽噎缠绵。但是，游动波流，却徒然叫人悲喜莫名、枵触万端，而不能知其究竟。

到底历史只永远表现为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，还是发展成无穷无尽的追寻？一切变化都归于既定的人类使命，还是它在变化中带领我们攀上幸福的顶峰？文明的骤起骤衰，恍若潮汐，人类的生涯有限，又怎能探勘历史的跫音、寻找文化的指标？暗夜长途，何处才是历史的光明？忽焉就死，历史对人生的意义又在哪里？……

任何人在面对这些问题时，都是相当惶惑茫然的。历史，常像雅士培（Karl Jaspers）所说，不时表现为一团乌七八糟的偶然事件，如急转的洪流，从一个骚动或灾难紧接到另一个，中间虽有瞬间出现的短暂欢乐，亦如小岛一般，终究也要遭到吞没。但有时，历史也并不全然如此盲乱，它仿佛如康德所说，是一种明智计划的理性过程，并不断趋向于成熟完美——虽然他也承认整个人类历史之网，是由愚蠢与幼稚的虚荣、无聊的邪恶、破坏的嗜好所织成。那么，历史到底是什么？历史中是否确能找到明显的因果关联或变迁的规律呢？

这当然是相当困难的事。我们传统的史学，大抵总相信历史的道德趋

向，王道理应成功、霸道终归失败，暴君一定亡国、仁者当然无敌。历史的道德规律，推动着历史的发展，所谓：“天有常度、地有常形、君子有常行”（东方朔·答客难）。西方自奥古斯丁（Augustine）以降，亦辄欲说明人类历史乃遵循一种形而上的律则在进行着，一切皆为上帝所安排，个人的遇合、国家的治乱，乃至皇权之成立，都决之于上帝的旨意与恩宠。十八世纪以后，因受科学发展的影响，认为人性与物理都须受自然法的支配，一切都决之于理智；而既以理智为依归，则人类即必须珍视自由，不自由，文化必定衰落。十九世纪后，又由于达尔文学说的影响，相信人类的历史一定是步步前进的，不管分成若干阶段，后一阶段总要比前一阶段好些。另一派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历史循环说或周期说，诸如“天下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”、“五百年必有王者兴”、“五德转移，治各有宜”之类，与西方思辨性历史哲学亦多有暗合者，其言甚为繁赜。这些主张，虽各有论点，但总都具有决定论倾向，不认为历史只是盲目的、偶然的聚合，故努力地想在历史的变迁中，抽丝剥茧，爬梳出一个规律的模型，以掌握历史的动态。不幸的是，历史事件之杂乱无章、庞然纷若，历史知识之性质特殊，往往使得这些规律在解释时遭到困难。所以自十九世纪兰克（Ramke）及普鲁士历史学派提倡经验的史学以来，黑格尔式思辨性的历史哲学即逐渐式微了；近代实证论及行为主义者，甚至都曾排除对历史之意义的追究。但是，这也是矫枉过正之谈，因为追问历史的意义，不仅是一种合法的（legitimate）探索，而且是我们非做不可的事。故奥古斯丁这个传统，在当代又渐有再生的趋势：梅耶霍夫（Meyerhoff）所编《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哲学》中，曾列举 Berdyaev, Barth, Niebnhr, Tiliich, Butterfield, Löwith 等当代思想家，来证明这一点。

纠缠于这些传统、质疑与趋势之中，历史，依然暧昧难明。那里面，自不乏小楼听雨、深巷买花的款款情致；那里面，也总含藏着铁马秋风、楼船夜雪的莽莽苍苍。英雄叱咤，遗民泪尽，千古兴衰，一纸论定。历史的浩瀚博大、庄严深邃，实非此类争辩与追诘所能穷尽。每当我们仰观苍穹，列星灿灿、浮云皓皓，便自然而然地会兴起这种充胀胸臆的历史感情，“思而不见，望古遥集”，历史的呼唤，于焉展开。

就是在这样的呼唤与感应中，历史才对此时此地的我们具有意义，而我们也才能真正进入历史中，去“观看”历史的动态，稽其成败盛衰之理。不管历史是理性自主的运作、是随顺理性的计划安排，抑或只是受到盲目意志的拨弄，既无理想目标，也无法则；我们观察历史的这个行动，本身就具有省察人类存在之历程的意义。而这种省察，也内在地开展了我们的世界，让我们超然拔举于此时此地之上，开拓万古之心胸，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。这不是遁世逃避，乃是积极开拓自我，并藉着这样一种活动，来跟现实人生社会做一番对照，以“察盛衰之理，审权势之宜”（史记·秦始皇本纪引过秦论）。换言之，历史纵使只是一条恶魔遍布的价值毁坏之路，观看历史，依然可以让我们更清明地朝向理性与道德的完美境域迈进。

这也就是说，历史的性质与功能，它所能提供给我们的，其实就在我们“观乎人文，察于时变”的行动中。人文的发展、价值的探索、社会的变动、人类一切理性与非理性的成就，俱在历史中向我们招手，并展露它广袤繁多的姿容；只要我们真正涉入其中，历史立刻就进入了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能通古今之变，参与历史的脉动。

历史遗忘了中国， 中国也遗忘了历史

古今之变，到今天可说是剧烈极了。

明朝末年，利马窦来华传教时，他所绘印送给中朝士大夫的舆地全图中，因为中国并不在中央，以致引起许多批评，《圣朝破邪集》里甚至攻击他：“利马窦以其邪说惑众，所著舆地全图，真所谓画工之画鬼魅也。试于夜分仰观，北极星乃在子分，则中国当居正中，而图置稍西，全属无谓。”（卷三）这时，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与文化，还是充满自信的，他们所表现的文化内容，也能让耶稣会远人欣然叹服：认为在世界各国仍处于蒙昧之时，中国即已有了孔子，孔子与基督有相同的神性与使命，是“真的神”；而儒教基于相爱之关系所产生的政治制度，迥异于西欧基于主人与奴隶的关系，对西欧社会，更为一优美之对照，要改造西欧，即有“接

种中国思想”的必要。

可是，不到二百年后，这种局面就完全改变了。在欧洲刮起的中国热，逐渐冷却；自十五世纪以来，基督教国家向“落后地区”扩展其文化的行动倒越来越炽烈。不仅有黑格尔这样的大哲学家宣称：“所有的历史都走向基督，而且来自基督。上帝之子的出现是历史的轴心”；诗人齐柏玲（Rudyard Kipling）也高唱“白人的责任”。所谓白人的责任，就是说白种人有责任“教导”有色人种，要他们采取西方的制度、西方的生活方式，并学习西方的技术。远洋殖民和贸易事业，逐步把他们这种“伟大”的理想推拓到非洲、亚洲。利用船坚炮利，轰开了天朝的大门，摇撼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。

于是，——夕阳残照汉家陵阙，天朝的光荣，恍若西风中的枯枝败叶。沉沦崩圯的世代、花果飘零的民族，这时所再呼喊的，便不再是历史与文化，而是接种西洋思想了。受挫折的中国灵魂，从此被迫去拥抱另一个天朝，学习另一套历史与文化，以重塑中国的未来，并理解中国的过去。

这当然是可哀的事。昔日的真神，现在概在打倒之列；历史被当做包袱，视为与现代对立的僵化凝固体、阻碍进步的绊脚石。任何人在面对中国历史时，都可以毫无敬谨谦抑之心、或庄严诚恳之情，都有资格恣意批判。很少人真正通过历史的属辞比事，以疏通知远，却大言炎炎，弃此历史文化如敝屣。社会上一般人，对历史更是隔膜，历史知识至为贫乏；即使是高级知识分子，对本国史，亦辄有比邻若天涯之感。

连横曾说：“史者，民族之精神，而人群之龟鉴也。代之盛衰、俗之文野、政之得失、物之盈虚，均于是乎在。故凡文化之国，未有不重其史者也”（台湾通史序）；章太炎也以为：“群之大者，在建国家、辨种族，其条例所击，曰言语、风俗、历史，三者丧一，其萌不植”（检论卷四·哀焚书）。这些，在今天大概都是不甚流行的看法。姑不论我们是否仍可称为文化之国，也暂时不管当前社会名流是否皆以竟作世界公民是尚，而耻言民族主义；倘若我们毫不讳饰地来看，自会发现目前我们对历史的淡

漠与无知，确实已经到了令人抚膺长叹的地步了。

造成这种现象，固然肇因于这次天朝变转的大变动，势之所趋，莫可奈何；但我们对历史教育的轻忽与僵化，实也是一大原因。至少在制度上，联招分组的办法，几乎强迫一半以上资质颖异的学子，从高中起便视历史为身外之物，从此不再接触。少年时期，如此缺乏历史的熏陶，长大以后又怎能奢求他们会有历史的感受和理解？而等到整个社会上的成人，都普遍欠缺历史的认知时，又怎么会尊重历史？怎么可能汲探文化的根髓？徒然让儿童去肩负背诵《三字经》、《唐诗三百首》的重任，就算达到了历史灌输的目的吗？何况，历史教育并非灌输即能奏效的。现今历史教育之所以收效甚微，不能激发国民的热情与向往，无法砥砺种性、激昂民气，教材之平板僵硬，自属重要症结。需知读史之要，在使人知政事风俗人才变迁升降之故，所谓“尧典可以观美，禹贡可以观事，咎繇可以观治，洪范可以观度，六誓可以观义，五诰可以观仁，甫刑可以观戒”（书大传）。我们的历史教育，似乎对此仍少措意。

当然，可以告慰的是：在学术界、高等研究机构中，仍有不少杰出的学者在从事历史之探索。但仿佛大家还不曾理解到：历史，尤其是自己国家文化的发展历史，并不只是一门孤立的学科，而是人存在的基石。人存在的意义，无不是根于历史而展向未来的，过去的历史传统，构成了我们理解的背景；我们之所以能立足于世界，并向这个世界开放的唯一依据，仰赖的就是这个力量。这个力量一旦不显，历史就成了搞历史的人的专职，成为纸面上的一堆堆资料，与公共大众无关；而我们的研究与教学，自然也就仅能局限于平面事件的排比与介绍，不再致力于观人交、察时变了。

但是，我们必须注意：当我们漠视历史时，历史也正在遗忘我们。

从前，四夷宾服，万方来朝的时代，我们天朝对于四裔远人及寰舆全貌，实在缺乏理解。而现在的天朝，也同样地没有把“落后地区”算进人类的历史里去。像房龙那本名著《人类的故事》里，你就几乎找不到人类之一，中国人的故事。威那·史坦恩（Werner Stein）原著，贝纳德·古伦（Bernard Grun）和华莱士·布劳克威（Wallace Brockway）英译增订

的《历史时间表》中，所指的历史，也不全是整个人类的历史，而只以西欧美洲为其重点；尽管印度、中国、日本等国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有记载，也非有意省略，“但作者们也没有做任何努力来调查这些地区的历史事件”（见该书序文）。

更有趣的例子，是唐斯（Robert B. Dowus）所写的《改变历史的书》（Books that Changed the World）。唐斯是著名的图书馆学家，他认为自文艺复兴以来，有十六本书改变了历史，这十六本书是：一五三二年马基雅维利的《君王论》、一七六六年潘恩的《常识》、一七七六年史密斯的《国富论》、一七八九年马尔萨斯的《人口论》、一八四九年梭罗的《不服从论》、一八五二年史杜伊夫人的《黑奴吁天录》、一八六七年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、一八九〇年马汉的《海军战略论》、一九〇四年麦金德的《历史中的地理枢纽》、一九二五年希特勒的《我的奋斗》、一五四三年哥白尼的《天体运行论》、一六二八年哈维的《血液循环论》、一七二九年牛顿的《数学原理》、一八五九年达尔文的《物种起源》、一九〇〇年弗洛伊德的《梦之解析》、一九一六年爱因斯坦的《相对论》。

这些书，在我们《辞海》的“中外历史大事年表”里差不多都提到了，但是像《传习录》、《四库全书》之问世，却不见于唐斯这份书单里。当然我们并不因此而否认这纸书单里的书确实影响深巨，确实改变了人类的历史；可是，这究竟是谁的历史？那个也曾参与人类文明之创造、也曾贡献世界历史之开展的中国，难道就这样被遗忘在历史之外了吗？

是的，天朝的灯影舞姿，正如是之璀璨，蜷缩在文化边陲的荒烟蔓草中，我们恐怕早已被剔除在历史之外，置诸天壤若存若亡之间了。

然而，何必慨叹？何用嗟伤？旁人本来也并没有义务要熟谙咱们中国的历史。而且，只要我们自己不遗忘历史，历史也必不遗忘我们。无人怀疑中国现在必须参与世界，必须接纳西洋文化，可是假若我们再想想当年新文化运动诸贤如梁启超、胡适等人开列“国学最低限度必读书目”时，为什么要说“并此而未读，真不得认为中国学人矣”，就可知道历史的认知，原无碍于新世界的开拓；历史文化的熏习，则是人生必备的条件之

一；至于对历史变动与发展的理解，更是国民最可贵的能力。何况，王国维说得好：“只分杨朱叹歧路，不应阮籍哭穷途”，因为：“穷途回驾原非失，歧路亡羊信可吁”（天寒）。处身在新旧交冲、中西激荡的伟大时代，加强历史的认知，正是穷途回驾，时犹未晚，且也是避免歧路亡羊的唯一办法。我们对此，自宜知所戮力。

只不过，中国历史源远流长，历史文献庞杂无俦，要了解中国历史的源流与变迁，我们“必读”的又该是些什么？

通古今之变：改变中国的划时代文献

以中国史学“疏通致远”的特质来看，寻求通古今之变的历史功能，乃是任何史著不论其体裁如何都想达成的目标。虽然像郑樵，标榜通史，以为：“自《春秋》以后，惟《史记》擅制作之规模”，班固“断代为史，无复相因之义……会通之道，自此失矣”（通志序）；但即使是断代为史，依然可以有会通之义，只是断代者包举一代，通史者综括古今，范畴各有所宜而已。

话虽如此，观时变而察古今，毕竟仍以通史为优。中国除《史记》之外，有《通典》、《通志》、《通考》这一类传统，囊括历代典章名物制度，而观其嬗递兴变之迹；也有编年为史的《资治通鉴》，其体制虽与记传不同，但实质上仍为一种通史。这些通史，著历代盛衰兴坏，以见事势之迁变，足以使人识大体而知条贯，自然是我们所该讽诵研读的。

但史文浩繁，旧籍所存，其实都是史家在面对他那个时代时，针对他所关心的问题而提出的解答，代表着史家个人的存在感受与历史理解。譬如史迁撰写《史记》，自谓：“欲以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，把究天人之际和通古今之变并举，同为他写史的两大宗旨。这种对天人之际问题的关切，乃是太史公特殊的存在感受与历史理解，也是他那个时代的主要问题。太史公对于这个问题，“究”的结果，是要于人事尽处始归之于天命；是强调天变与政事俯仰；是主张为国者必贵三十年一小变五百年一大变的天运，然后天人之际续备；是坚持天道难知，而人道可

期，道不同时，则各从其志……等等。我们看《史记》时，触目所见，都是“岂非天哉”、“此非天命乎”、“人能弘道，无如命何”、“非天命孰能当之”、“乃天也”一类话。这些话显示了《史记》正是司马迁对历史提出的解答。旁的史家，关切的不是这个问题，其解答便当然不同，胡三省“新注资治通鉴序”说司马光写《通鉴》时，正与诸人争论国事，因此：“其忠愤感慨不能自己于言者，则智伯才德之论、樊英名实之说，唐太宗君臣之议乐、李德裕牛僧孺争维州事之类是也。至于黄幡绰石野猪俳谐之语，犹书与局官，欲存之以示警。此其微意，后人不能尽知也，编年岂徒哉！”讲的也是这个道理。

既然如此，则我们阅读这些史著，便不只是熟悉它们里面所记载的历史事件，而是重新经验该史家的问题与解答，重新认知他的存在情境。这种经验与认知，诚然十分珍贵，诚然如柯林乌德（R. G. Collingwood）所说，是“重新思考别人所思考的当儿，就是自己在思考所思考”（自传第十章）；但那毕竟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，毕竟不是在这中西交冲巨大变动时代所急欲寻求的答案。我们需要一部能够具体而清晰显示中国历史之变迁与发展的史著，好让我们观人文，察时变，揭明中国历史的源流。

这种史著，乃是新时代的需要，因此非旧有史籍所能替代；而事实上，身当我们这个空前奇异伟丽的时代，是理应有大史学家出来，网罗放失旧闻，恢张高情宏识，创以新体，勒成一书，为史学开一新局面，如太史公或司马温公那样。不幸现在我们并没有这样的史家，也没有这样的史著，通史大业，坠绪茫茫，贤者不作，实令人有“小子何述焉”之慨！

我们无从取则，又无法缄默，无此学识，自然也不足以当纂修之任，没有办法，便只好用选文来替代著述。当此“莽莽神州入战图，中原文献问何如”之际，征文考献，选辑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文章若干篇，略仿编年之体，排列条贯。任何人只要看了这些文章，中国文化如何转塑成形，中国历史如何兴动迁变，必皆可一目了然。

历史，在变动中

我国选文总集的传统，向来以文学为主，《四库提要》谓总集为：“文章之衡鉴，著作之渊藪。三百篇既列于经，王逸所哀，又仅楚辞一家，故体例所成，以挚虞《流别》为始”（卷一八六），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。固然总集中也不乏《三台文献》、《中原文献》、《清源文献》、《岭南文献》、《经世文编》这一类具有史学意义的东西，但从未蔚为传统。其实，编总集，可以有门类；选文章，可以定宗旨，这跟史家的别择心裁，不是恰可相通吗？辑录原始文献，让材料自己说话，不也跟历史的客观性要求相符合吗？运用这种方式来作史，不单可以开拓传统选集的领域，更能圆满安置历史的主观性与客观性问题，对于“文章者，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”这一事实，尤其是有力的印证，昔人见不及此，实在是很可惜的事。

何况，一切历史的变动，都要显示在人文成品上，而文字，即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。文章本身，不仅记载了历史，也解释了历史。而这些遗存的文献记载之中，又有一些，不只是记载，不只是解释，更直接塑造了历史，产生了绝大的变动，引导人类或一个文明走向另一个全新的境地。例如董仲舒的《贤良对策》、韩愈的《原道》、孙中山的《民报发刊词》、胡适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之类，历史之流，因这些文献出现，而扭动了航道，因此，它们是积极性改变了历史的文章，一纸之微，旋乾坤。

另外，还有些文章虽并未直接塑造、改变历史，可是它反映了时代的变动，刻画了历史的轨迹，影响了后来的发展，如秦始皇的《初并天下议帝号令》、嵇康的《养生论》、欧阳修的《朋党论》、梁启超的《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》等等，对历史之流衍，亦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这些文章，是中国历史甬道里，一座座里程碑、一盏盏标示其曲折面貌的灯簇。把这些烟火灯盏，串连起来，即成了一条蜿蜒灿烂的中国之路。中国，就是这样一步一步、一站一站走过来的。

换句话说，历史，如果有所谓的“转捩点”，这就是了。透过这些文章，我们可以发现历史不断在转捩点上，人类也永远在对其生存情境做价

值的判断、意义的创造、技术的更新和生命转捩点式的抉择。他们或如“太极图说”，张皇幽眇；或如“天工开物”，寄情物理；或究几何之原理，或申雍发之禁令；或者馆开四库，或者奉天讨胡；孔子改制、铁云藏龟，政治经济学术科技，各个层面仿佛都在齐声用力唱出一种历史的理则：人类的历史，毕竟是由人类自己用他自由的意志与思索，努力创造出来的；不论幸福还是沉沦，一切也都得由他自己来负担。

这本选集，就是想表示这样一种观点。

选文的体例，是经义奥旨、诸子成书，只发挥思想哲理，而不涉及历史变动者不选；影响深巨，难以句摘篇选如《论》、《孟》、《老》、《庄》之类，也无法甄录。同一事，而其变动见于各文者，则择其尤要者；假如改变历史的，不是一篇文章，而是一本书，如欧阳修《集古录》、严复《译天演论》之类，便以序代书，藉见一斑。每篇文章后面，略作注释，并附译文，以便读者阅读。最后，则加上编者们对该文的诠释，简要说明文章的内容、写作的背景以及造成的影响等。

这样的编写工作，当然困难甚多，因为上下五千年，什么文章改变了历史、什么文章足以显示历史的脚步、什么文章具有里程碑的意义、什么文章展现了文字的尊严与力量？实在颇费斟酌。而且，这些文章不是早已溶入中国的血液中，释义繁多，师法纷杂，难以董理；就是从来没有人诠释过，其名物度数随时代变迁而难以稽考。编写者限于学力和时间，仓促就事，亦无法探骊得珠、曲尽其要。至于以今言释古语，本是训诂的旧例，现在却要全部“翻译”成白话文，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，其不如人意，还用得着说吗？但椎轮大辂，本来就是历史的通例，假如这种编辑理念没有大错，这种历史观点和通史的要求还不算太荒谬，则这次粗糙的尝试，便不会是毫无意义的。更周全的历史诠释、更具代表性的篇章、更广泛的层面，都可以在增订时重作调整。

编辑这本书，原先是周浩正先生怂恿的；编写过程中，陈恒嘉先生的辛勤奔走、编写诸友人的案牍劳形，都令我甚为感动感激。我知道他们之所以愿意如此辛劳，是因为相信这本书可以成为现代国民“必读”的历史读本，相信中国历史的源流与发展可以藉此展示出来。但我偶尔也会忆起

陆放翁的诗句：“镜虽明，不能使丑者妍；酒虽美，不能使悲者乐”（对酒叹），没有一部历史能自然彰示其意义，除非读者自有其存在的感受与之相应；我们也不能从任何一部历史著作中学到什么，假若我们并无历史感。读者能从这些改变中国的文章里，改变自我，呼唤起自己的存在感受来与它对应，以期相视而笑，莫逆于心吗？

或许，这也是个转捩点吧？

一九八六年六月端阳写于台北龙坡里